



## 汉代郑州的“薄亭”与“亳聚”

张立东

**摘要:**作为亳都的郑州商城在商代中期沦为废墟。战国中期韩国占领亳城以后,全面修缮了内城,并命名为“管”。此后商代亳城之名逐渐被人遗忘,致使诸种亳说的不断创立。然而汉代的郑州地区仍有名为“薄亭”“亳聚”之地,留下了商代亳都的重要遗痕。两者或同地,或相距甚近,就在郑州西南郊的常庙城址一带,那里曾是韩国管城亳字陶器的特供作坊。

**关键词:**郑州商城;薄亭;亳聚;常庙城址

**中图分类号:**K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5669(2021)01-0087-05

经过30多年来的资料积累和研究讨论,郑州商城即商代亳都的说法已经成为学术界的主流<sup>①</sup>。然而学无止境,此说的一些细节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郑州商城的废墟在春秋晚期仍被称作“亳城”。战国中期韩国占领这座废都之后,即全面修缮其内城,并命名为“管”。此后郑州之“亳”名逐渐被世人遗忘,到西汉中期人们已不知郑州地区曾经名“亳”,从而导致了诸多亳说的不断创立<sup>[1]213-226</sup>。不过,汉代的郑州地区仍有包含“亳”字的亭、聚之名,这些小地名为我们探讨郑州商城的本名提供了重要佐证。

传世文献将“薄亭”归于荥阳,而考古资料表明“亳聚”就在常庙城址。综合考察这两个小地名,有助于整合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和遗迹遗物,以推断两者的具体位置,从而考察郑州商城留在汉代地名方面的遗痕<sup>②</sup>。希望我们的努力能为完善郑亳说、厘清郑州的历史沿革略尽绵薄之力。

### 一、薄亭

《后汉书·郡国志》：“荥(荥)阳有鸿沟水。有广武城。有薄亭，薄叔国。有陇城。有薄亭。有敖亭。有荥泽。”<sup>[2]3389</sup>

“薄”即“亳”。此两字的通假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薄”是“亳”的通假字中使用频率最高者。邹衡师曾罗列关于汤都亳的先秦文献,其中《孟子·滕文公下》《墨子·非命上》《荀子·正论》《荀子·王霸》《战国策·楚策四》《淮南子·泰族》等为“亳”,而《逸周书·殷祝》《墨子·非攻上》《荀子·议兵》《管子·轻重甲》《吕氏春秋·具备》等为“薄”<sup>[3]185</sup>。

关中地区有“亳亭”。《史记·封禅书》：“于(社)[杜]、亳有三社主之祠。”集解：“韦昭曰：‘亳音薄,汤所都。’瓚曰：‘济阴薄县是。’”索隐：“徐广云：‘京兆杜县有亳亭,则“社”字误,合作“于杜亳”。且据文列于下皆是地邑,则杜是

收稿日期:2020-11-04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豫北地区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16BKG01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立东,男,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河南开封 475001),主要从事夏商周考古及与历史、古文字等学科的交叉研究。

县。’案：秦宁公与亳王战，亳王奔戎，遂灭汤社。皇甫谧亦云‘周桓王时自有亳王号汤，非殷也’。而臣瓚以亳为成汤之邑，故云在济阴，非也。案：谓杜、亳二邑有三社主之祠也。”<sup>[4]</sup><sup>1376</sup>《汉书·郊祀志》：“于杜、亳有五社主之祠、寿星祠。”师古曰：“杜即京兆杜县也。此亳非汤都也。不在济阴。徐广云：‘京兆杜县有薄亭，斯近之矣。’”<sup>[5]</sup><sup>1208</sup>同为徐广之语，《史记》索隐引为“亳亭”，《汉书》颜注则引为“薄亭”。

由《史记》《汉书》和《后汉书》的记载来看，汉代通行的写法似乎是：关中者为“亳亭”，郑州者为“薄亭”。汉代的“亭”与当时的邮驿系统关系密切<sup>[6]</sup><sup>162-164</sup>，其定名应当比较系统化，有可能刻意用不同的字将两者区别开来。

当年邹衡师曾把郑州地区的“薄亭”作为郑地之亳的补充证据<sup>[3]</sup><sup>196</sup>，笔者则直接将荥阳的薄亭、敖亭与汤都亳、仲丁都敖相联系，以与偃师的汤亭对读<sup>[1]</sup><sup>225</sup>，现在看来，这种联系值得进一步讨论。

关于薄亭的具体位置，很少有人论及。李维明断定汉代的薄亭就在郑州的汉城：“《后汉书志》第十九郡国一河南尹：‘荥阳……有薄亭。’……按：东汉时无‘郑州’名，此地时属河南尹荥阳辖域。郑州市内存有依据东周城址南部修建的汉代城址，因其附近出有商代‘毛’字刻辞和大量东周‘亳’字陶文，与《后汉书志》记荥阳薄亭相合。据此判断郑州市东汉时期为薄地，曾设有‘薄亭’，归荥阳所辖。”<sup>③</sup>刘余力则推定薄亭在今河南荥阳市西，但并未列出任何证据<sup>[7]</sup>。

虽然现在还无法准确考定汉代“薄亭”的确切位置，但是可以根据《后汉书·郡国志》的记述，大致推定其范围。《郡国志》：“中牟有圃田泽。有清口水。有管城。有曲遇聚。有蔡亭。”其中的管城应即叠压郑州商城内城的战国韩城。对照上引的“荥阳县”条，可知《郡国志》将“薄亭”“管城”分别列入荥阳、中牟两县，两者显非一地。换言之，汉代的“薄亭”与“管城”之间必有一定距离，“薄亭”不可能位于“管城”之内。

只是分属两县的两地未必相距很远。如果两者都位于两县交界地带，其间的距离也许很近。鉴于汉代已经不知郑州乃早商亳都，“薄

亭”之定名或许依托某个与亳都相关的地名，而不一定与亳都直接相关，因此其与郑州商城的内城有一定距离也是可以理解的。与邮驿关系密切的汉代之亭一般位于居民点之外的道路之侧，而且取名明显偏爱古地名，因此“薄亭”不一定直接因商代亳都而得名。

## 二、亳聚

“亳聚”陶文是1985年张松林在常庙城址采集的。该城位于郑州市二七区马寨镇的常庙村周围，距郑州韩城西南角约10公里。总体为长方形，南北长约2000米，东西宽约500米<sup>[8]</sup>，周长约5000余米。当初调查时城墙仍高达10余米，基宽20余米。城内散落有大量战国秦汉陶片和瓦片。在10余枚豆柄上发现有戳印陶文，内容有“公”“亳”等。

根据调查报告的文字描述，“亳聚”应为戳印而成，只是发表的拓本上仅见左侧上部和下侧的边栏。两字均为阴文，上下排列，其间未见边栏，因此两者应是同章双字，而非同器双章。对于陶文的出处和时代，报告无详细说明。陶文是在“战国秦汉遗址与城址”一节报导的，而在“遗址概况”一节里列举的六处“遗址”与“城址”中，仅“常庙城址”部分提到出土有陶文，故此“亳聚”陶文应出自常庙城址<sup>[9]</sup>。靠上的“亳”字与郑州战国韩城出土的印文“亳”字极似。靠下之字右半有所残缺，但左上角的“耳”是比较清楚的，释“聚”应是目前的最优选，已为《陶文字典》等采纳<sup>[10]</sup><sup>231</sup>。

关于陶文的具体年代，学者之间有不同看法。郑杰祥提到“在今郑州市的西南隅，发现印有‘亳聚’二字的秦汉时期的陶器文字”<sup>[11]</sup><sup>232</sup>，但附图之名则是“郑州西南郊出土秦代‘亳聚’二字合文”<sup>[11]</sup><sup>239</sup>。综合以上两点，可知是将其定为秦汉时期，而更倾向于秦代。李维明、袁广阔等则视之为东周遗物<sup>④</sup>。

我们认为“亳聚”陶文很可能属于汉代。首先，“聚”字的写法近于汉隶，而异于战国文字和秦篆。楚系简帛文字的数例，上部大多是左“耳”右“又”的“取”字，下部为三“人”，与“众”字下部相同。睡虎地《日书》乙本和楚帛书也有下

面从二“人”的例子<sup>[12]45, [13]386</sup>。《说文》所收秦篆也是下从三“人”。汉隶中的“聚”字下部的主体为一竖划,上有帽状短划,左右各有两划,虽然是由早期的“三人”之形演变而来,但字形已有很大变化<sup>[14]129下</sup>。常庙出土“亳聚”之“聚”,下部中间的竖划很清楚,其左右各有两个近乎平行的斜划,总体与汉“聚”近而与楚、秦之“聚”远(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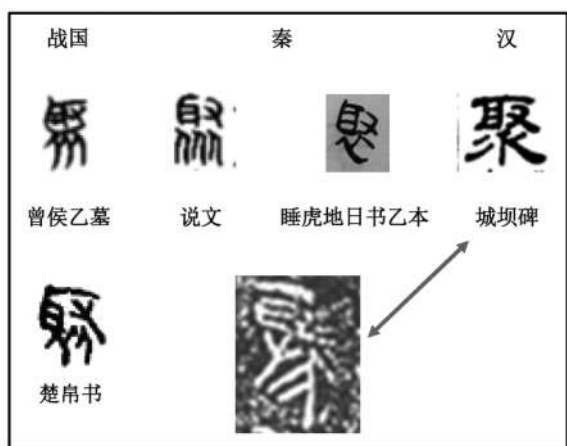


图1 战国秦汉之“聚”

作为聚落名称的“聚”盛行于汉代,见于《汉书·地理志》和《后汉书·郡国志》,而未见先秦和秦代聚落称“某聚”的材料。《说文解字》释“聚”：“会也。从叴,取声。一曰邑落曰聚”。段玉裁注：“邑落谓邑中村落。”<sup>[15]387</sup>《汉书·平帝纪》：“立官稷及学官。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校。校、学置经师一人。乡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经》师一人。”颜师古注：“张晏曰：‘聚,邑落名也。’师古曰：‘聚小于乡。’”班固《东都赋》：“是以四海以内,学校如林,庠序盈门。”唐李善注：“韦昭曰：‘小于乡曰聚。’”<sup>[16]38</sup>王先谦认为韦昭之语是颜师古注之本<sup>[17]142</sup>。《史记·五帝本纪》：“舜……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正义：“聚……谓村落也。”<sup>[4]34</sup>

综合以上诸释,可知聚是村落,而且是“邑中村落”,规模小于乡。王彦辉断定：“‘聚’‘聚落’……就其概念而言是战国以后的新名称,具有自然形成的聚居地的含义;‘里聚’‘聚邑’‘xx聚’则是国家行政管理下的称谓。其中‘里聚’指的是开放式的村落,‘聚邑’则属于具体的行政村,‘xx聚’则是名都大邑周围的卫星城或县属的乡镇。由‘聚’而发展为‘里聚’‘聚邑’

‘xx聚’,是由‘聚’、‘邑’演变为乡镇的大体路径。”<sup>[18]</sup>综合段玉裁所说的“邑中村落”,以及王彦辉所归纳的自然居地、卫星城或县属乡镇等,我们似可将“聚”理解为自然形成的、类似城镇化的、有较多非农业人口的居民点。

明确了“聚”的意义之后,就可以深究“亳聚”两字的含义。就像《汉书》《后汉书》中的众多某聚一样,亳聚应即名亳之聚。关于以“亳”为聚名的原由,郑杰祥认为：“聚即作为居民点的城镇村落,聚落以亳命名,可见秦汉时期人们仍然知道这里原是古代的亳地。联系上述资料,‘亳丘’‘亳聚’所以以亳命名,都应是沿袭了这里的商代亳邑的名称,正如同现代的郑州市有一条称做‘商城路’的道路一样,它无疑是因为这里有座商代城址而命名。但是由于文献记载西周管叔封于此地,因此后世就管城名显而亳邑名隐。”<sup>[11]232</sup>李维明则谓“‘亳聚’指亳地之居邑”<sup>[19]</sup>。二说有所区别,郑说强调聚用亳名,李说则强调亳地之聚。二说的共同之处是认为“亳聚”中的“亳”是指整个郑州商城区域,而且都认为“亳丘”“亳聚”的命名方式是一样的。这两种说法显然都是值得商榷的。

其一,“亳丘”“亳聚”的命名方式有相似之处,但从本质上是不同的。“亳丘”主要用来指称亳城故址,对于当时的城邑来讲主要是虚称,而非实称。“亳丘”之称与现代汉语中的“殷墟”有一定相似之处。“殷墟”虽然在有些语境中可以代替安阳,但主要用来指称商都遗址,并非现代的行政机构或聚落名称。“亳聚”则是实打实的聚落名称,“亳”只是这个聚落的名称,或许与亳都故址有关,但不一定直接相关。

其二,鉴于上文所论“聚”这种聚落的性质,“亳聚”的具体所指应是某个小聚落,规模上要远小于郑州商城或战国韩城。换言之,亳聚应是汉代“管城”之外的一个聚落。

至于亳聚的具体所在,首先应该考虑陶文所出的常庙城址。近年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常庙城址进行了发掘,新的出土资料对我们推定亳聚的位置颇有助益。目前看来,将亳聚指认为常庙城址一带是可行的。发掘者断定此地战国时期“是专业的制陶城,因为处处都有制陶作坊和陶窑的遗址”。发表照片的豆把之

上有两个单独的印文,上一个是“亳”字,确与郑州战国城东北隅出土的亳字陶文颇似(图2)。可见此处制陶作坊至少是郑州韩城“亳”字陶豆的制造地之一。若用现代语言表述,似可将此处制陶作坊理解为“亳”字陶器的特供作坊。



图2 常庙古城出土印有“亳”字的陶豆  
(据王银廷、廖谦:《陶器上“印章”是战国商标?》,《郑州晚报》  
2008年3月7日A11版)

将亳聚定位于常庙城址,也有利于重构其命名过程。虽然最初调查时常庙城址“内散落有大量战国秦汉陶器残片和瓦片”,但后来发掘的陶片却“多为春秋战国时期的遗物”<sup>[20]303</sup>,并有报道将城址明确称作“战国古城”。由此可以推断常庙城址的年代很可能与郑州韩城相当,汉代已成废墟。城内出土的汉代陶片,包括印有“亳聚”者,则反映了汉代仍有人居住。虽然已有资料尚不足以说明该地汉代聚落的规模与性质,但受战国制陶业的影响,可能仍有不少的非农业人口,与上文所论“聚”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惯例相符。至于其以“亳”为名,很可能与曾经长期大量生产戳印“亳”字的陶器有关。作为“亳”字陶器的特供作坊,原来的地名中也可能包含“亳”字。郑州亳都旧城被韩国人改造为管城之后,“亳”之旧名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至西汉中期的董仲舒时代郑州的亳都已鲜为人知了。此时,作为曾经的“亳”字陶器特供作坊,即便以前没有以“亳”命名,当地俯拾即是“亳”字陶片也可能引导人们将此处制陶之聚命名为“亳聚”。

## 结 语

汉代郑州的“薄亭”与“亳聚”是郑州商城在地名方面的遗痕,两者是可以整合的。当时坐落在郑州商城遗址之上的是归属中牟县的“管城”,与归属荥阳县的“薄亭”应有一定的距离。将“亳聚”推定在“管城”正西偏南的常庙城址,且认定“亳聚”与荥阳县的“薄亭”相距不远,正与荥阳县在中牟县之西的相对位置相合。只是“薄亭”与“亳聚”属于不同的系统,两者有可能位于同地,也有可能是相近的两地。

“薄亭”与“亳聚”位置的推定对郑州商城即商代亳都的讨论颇有助益。战国中期韩国占领郑州商城的废墟之后,对内城进行了全面修缮,并命名为“管”。此后,已成为古地名的“亳”仅在一些特定的场合,例如纪念晋悼公十一年亳城之盟的仪式上使用,因此郑州商城为商代亳都的认识逐渐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董仲舒《春秋繁露》和司马迁《史记》对郑地之亳丝毫未提,说明当时已经不知“管城”就是商代的亳都。“薄亭”与“亳聚”为我们留下了汉代居民对商代亳都的点滴记忆,这些记忆碎片对于我们确认郑州商城的真实身份大有帮助。

### 注释

①邹衡:《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文物》1978年第2期。中国古都学会、郑州古都学会编:《中国古都研究:郑州商都3600年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古都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②“遗痕”一词参见徐莘芳:《现代城市中的古代城市遗痕》,《远望集》,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695页。③参见李维明:《郑地亳城文献补正》,《中原文物》2009年第6期,第49页,注释40。④李维明:《郑州出土商周时期“匕”声字辞与汤亳探寻》:“郑州市区西部常庙所存东周城址当属‘匕’声‘亳’邑落,其规格低于‘亳丘’……郑州商城据地约方76里,东周2座分别出土‘亳丘’‘亳聚’相邻城址联地不小于方87里,与东周文献记载商汤亳地域相近。”详见《故宫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1期。袁广阔:《郑州商城与偃师商城关系的考古学观察》:“郑州一带出土东周时期带‘亳’‘亳丘’‘亳聚’……等陶文。”详见《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

### 参考文献

[1]张立东.夏都斟寻与商都亳合考[M]//考古学研究

- (五): 庆祝邹衡先生七十五寿辰暨从事考古研究五十年论文集.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3.
- [2] 范晔. 后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5.
- [3] 邹衡. 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1980.
- [4]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 [5]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 [6] 刘广生, 赵梅庄. 中国古代邮驿史: 修订版[M]. 北京: 人民邮电出版社, 1999.
- [7] 刘余力. 平首布文字研究[D].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5.
- [8] 雨亭. 徜徉今古间: 郑州常庙古城探秘[EB/OL]. (2009-10-13)[2020-09-23]. [http://www.hawh.cn/whzx/2009-10/13/content\\_77326.htm](http://www.hawh.cn/whzx/2009-10/13/content_77326.htm).
- [9] 张松林. 郑州市西北郊区考古调查简报[J]. 中原文物, 1986(4): 1-11.
- [10] 王恩田. 陶文字典[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7.
- [11] 张立东, 任飞编著. 手铲释天书: 与夏文化探索者的对话[M].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2.
- [12] 高明, 涂白奎. 古文字类编: 增订本[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 [13] 何琳仪. 战国古文字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8.
- [14] 顾藹吉. 隶辨[M]. 中华书局, 1986.
- [15] 段玉裁. 说文解字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16] 萧统编. 文选[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 [17] 王先谦. 汉书补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18] 王彦辉. 秦汉时期的乡里控制与邑、聚变迁[J]. 史学月刊, 2013(5): 20-28.
- [19] 李维明. 郑地亳城文献补正[J]. 中原文物, 2009(6): 44-49.
- [20] 顾万发. 文明之光: 古都郑州探索与研究[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 “Boting” and “Boju”: Han Dynasty Place Names near Present-day Zhengzhou

Zhang Lidong

**Abstract:** The Zhengzhou Shang City, capital Bo of Shang Dynasty, was ruined during Middle Shang. Its inner city was renovated by the State of Han during Middle Warring States Period, and renamed as Guan. Thereafter the original name Bo was gradually forgotten, and resulted in various misidentifications of Bo. However, during Han Dynasty there were still place names with the Bo character in the vicinity of the ruined city, leaving important imprints of the Capital Bo. The Han Dynasty Boting and Boju should be one place or two neighboring places, and probably near the Changmiao City in the southwest suburb of presentday Zhengzhou, where used to be the specialized workshop for the potteries stamped with the Bo character in the Guan City.

**Key words:** Zhengzhou Shang City; Boting; Boju; Changmiao City

[责任编辑/周 舟]

(上接第75页)

## The Utilization of “Local Suitability” and Changing Customs in Pre-Qin Dynas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ocal Suitability” and “Liyan”

Hu Dalei

**Abstract:** The universality of “local suitability” means that doing things should be in line with the local actual situation; in the pre Qin period, various countries used “local suitability” to implement local advantages; to formulate national economic, cultural, population, talent and even music making policies with “local suitability”; most of the works of pre Qin philosophers had “geographical features” in line with “local suitability”, and scholars should also lobby from “local”.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reform, the “local suitability” should complement the court’s changing customs to achieve the “timely” progress of the tim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unification of the world, “local suitability” has disappeared, and the unified education of “changing customs”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Key words:** local suitability; policy; argument; changing customs

[责任编辑/原 孟]